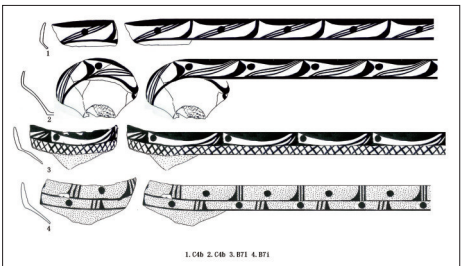


续说“西阴纹”

王仁湘



夏县西阴村遗址 1926 年出土“西阴纹”标本



西阴村新出彩陶盆，倒置即为器盖

在纪念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 90 年的研讨会上，我曾经系统讨论过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西阴纹”，后来还进行过补充研究。最近又有对西阴村新发现的思考，这次是西阴村发现百年之际三说“西阴纹”了。

“西阴纹”是一种很特别的弯角状纹饰，而且是一种需反观的地纹纹饰，它发现很早，传播也很广。这类纹饰早在西阴村初次考古中就有发现，也许仅仅是因为它的构图过于简练朴素，更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描绘的究竟是什么，所以在研究者早先的论著中很少提起它。它因为较早发现于西阴村遗址，被李济先生称之为“西阴纹”。

我曾经说过，以一个遗址名称来称呼“西阴纹”一类纹饰，这在中国史前考古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指出也是莫若何之举。我还以为它是中国史前彩陶中很值得研究的一类纹饰，它的构图均衡洗练，图与器结合恰到好处，时空特征都非常明确。

“西阴纹”这类纹饰其实最先安特生在渑池仰韶村就有发现，在西阴村之后的庙底沟文化同期遗址有更多发现。我最初讨论时就说过，这是后来发现数量很多的一种彩陶纹饰，一般作为直口或折腹钵口沿外的装饰，都是采用二方连续的构图方式。这种彩陶分布的范围也很广，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

“西阴纹”彩陶的主要分布区，是在关中及邻近的豫西、陇东和晋南地区，更远的南方鄂西北、江南洞庭湖地区和北方河套以北地区，也都有“西阴纹”彩陶。往东，“西阴纹”彩陶的分布范围应当没有越过豫中郑州地区，这表明东部地区不怎么认同和接受它。

同典型鱼纹一样，在关中找到河套的中介地带，也没有发现“西阴纹”彩陶，不能清晰地了解到这类纹饰向北的传播过程。当然“西阴纹”彩陶向南的传播虽然到了洞庭湖地区，由鄂西北到那里的中间地带也没有见到相关资料，其向南的传播过程与传播路线，我们同样也并不是很清楚。

“西阴纹”的最初起源地可能并不是夏县西阴村，但有可能是在晋南，也有可能是在关中或是陇东地区。当然“西阴纹”最早是出现在半坡文化的彩陶上，在庙底沟文化中是寻不到它的起源的。

系统梳理彩陶的印象是，小型直口或敛口的陶钵，是二方连续构图“西阴纹”的固定装饰体。这种陶钵，应当是一种日常使用的食器。作为一种食器装饰使用的“西阴纹”，它内在的含义值得深入探究，它不应当只是一种纯粹的装饰纹样。当然新发现的遗址中也见到新类型的陶器装饰有“西阴纹”，如河南灵宝西坡遗址除了彩陶钵之外，在有的器座上也会绘有精致的“西阴纹”。

庙底沟文化以后，“西阴纹”随着彩陶的衰落也消失不见了。

在以往出土的大溪文化彩陶上，可以辨识出若干例“西阴纹”，而且除了陶钵以外，还有深腹罐，个别甚至还有绘双列“西阴纹”的例子。

有了这些新辨识的“西阴纹”彩陶，再想想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的多例发现，就觉得是很自然的事了。雕龙碑除了有接近庙底沟那样的彩陶钵，也见到绘有“西阴纹”的深腹罐，那里原来是个文化的中转站，它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勾连起来了。

虽然资料非常丰富，但我们现在并不能确切判明西阴纹的最初来源在哪里。这是一种形状特别的几何纹饰，它有可能来自某类象形图案。以前张朋川先生论证

过，以为它是鸟纹几何化的结果。我后来由鱼纹的演变中得到一个线索，以为“西阴纹”是鱼纹几何化的结果。而且这种几何化由半坡文化时期就已经完成，完成的地点是在陇原。这个论题如果可取，那有些问题就有了重新探讨的理由，还可以作更深入一些的研究。

据“考古汇”2026 年 7 月 22 日《新展推介：花开西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报道，山西考古博物馆正在展出一批新发现的仰韶彩陶，其中展品上有一件出土自夏县西阴村的彩陶器，定名为圈足彩陶盆。纹饰似曾相识，但形制却前所未见，看罢图片，心生疑惑。

这一件名为圈足盆的器形罕见于仰韶，名为盆尚可，但这样的圈足器在仰韶却不曾发现，很怀疑它可能是器盖，被认作圈足的所在其实可能是器盖的抓手，器物需要倒过来认知。

再说似曾相识的纹饰。从纹饰观察，这件器物也需要倒过来认识。这是一件三色彩陶，分绘黑白褐图案，是仰韶偏晚期的风格。通体先着白衣，再以黑色勾绘轮廓衬底，后以褐色点绘。所绘纹饰既生又熟，不过将器物倒视一看就非常明白了，原来是常见的“西阴纹”与叶片纹组合，都是庙底沟时期彩陶典型元素。不论是西阴纹抑或是叶片纹，在庙底沟时期都有固定的构图方向，取左低右高的斜行方向，概莫能外。同类的带有鸟首形体的西阴纹，以往在渑池仰韶村及其他遗址都见到过。就以这个特点来看，西阴村的这件彩陶器原本是要倒过来用的，它是盖，不是盆。

由器形到纹饰，这件器物都需要倒看倒用。当然，即使我们暂且当它是器盖，在仰韶文化中也是不曾见到过。只是在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过一件当作钵的彩陶器，它可能是器盖，也属罕见。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印出版的《河南史前彩陶》中，就是这同一件彩陶，以线图出现时称为盖，以彩图出现时称为钵，名称也取两可之间，可以想见定夺两难。

也许，当初益与盖分时段使用也未可知。对于庙底沟文化而言，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彩陶器，而且是出自具有象征意义的西阴村，绘有“西阴纹”，可视为西阴村的吉物，值得铭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烟台市福山区近现代文物建筑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研究

林丽颖

近现代文物建筑是城市发展进程的历史见证，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提出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确定了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基本方向。如何在坚持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实现活化利用，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已成为各地文物建筑保护工作面临的共同课题。

烟台市福山区位于山东半岛北部，近代烟台开埠后，福山涌现出一批兼具胶东地域特色与外来文化特征的建筑。其中福山卍字会旧址、大成棧旧址、斗余天主教堂三处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通过梳理上述文物建筑的历史沿革与价值特征，考察其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实践路径，总结其经验做法与启示，以期同类文物建筑的保护利用提供借鉴。

研究对象概况与价值特征

福山卍字会旧址

福山卍字会旧址位于福山区城里街 143 号，三进院落，平面呈梯形，共计 11 座房屋。2022 年被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烟台市现存不多的四合院式建筑群之一。建筑群组合规整又不乏丰富变化，造型朴素大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文物利用价值。旧址前身为福山画家李程九的“听松斋”画室。1928 年春，李程九捐出画室用于红卍字会慈善事业。自此，这里先后成为妇孺收容所、仁德小学校、平民夜校等慈善公益机构所在地，是近代福山慈善公益事业发



福山卍字会旧址开展经典诵读公益文化活动

展的历史见证。

大成棧旧址

大成棧旧址位于福山区盐场村 816 号，建成于 1917 年，2006 年被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胶东地区现存不多的庄园式四合院建筑群之一。主体建筑为四进正房，每进 11 间，左右各为四进厅房和住宅。建筑布局中轴对称，形制古朴典雅，对研究胶东民居建筑形态具有参考意义。旧址原为创办人王宾的庄园式住宅，王宾曾在烟台、青岛、上海等地经营货棧。该旧址见证了近代烟台沿海城乡参与东北亚海上贸易的历史，是研究近代烟台工商业发展与海上贸易活动的重要实物资料。

斗余天主教堂

斗余天主教堂位于福山区区家后村北，始建于 1915 年，2004 年被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单体建筑三处，包括位于院落正中的教堂、教堂以东的教会学校及修女院正房。教堂由法国传教士郭神甫主持兴建，是烟台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教堂之一，其建造方式中西结合，具有独特的艺术构成方式，对研究近代西方宗教活动在华传播及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发展文旅不可多得

的资源。

上述三处文物建筑分布于福山城乡，涵盖绅商宅院、宗教建筑等类型，共同反映了近代福山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历史面貌，是研究烟台开埠历史与胶东地域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对其开展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是延续文脉、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举措。

修缮保护的实践与长效机制的构建

修缮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福山区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尽可能利用原有材料，保存原有构件，使用原有工艺，以加固、保护为主，尽量减少更新。同时，参考历史时期的照片等资料，对后人改动部分按原状予以复原、修复或拆除，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建筑自身所携带的历史信息。

在上述理念指导下，福山区立足三处文物建筑的实际情况，分期组织实施修缮工程。

2016 年，福山区完成了福山卍字会旧址文物保护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及保护规划的编制；2018 年，完成了基础加固、消防、安

防、防雷、亮化及一进院、二进院本体修缮等系统工程。2023 年，又针对文物建筑病害，组织编制了福山卍字会旧址修缮保护设计方案；2024 年，完成了三进院文物本体修缮、油饰等工程。

2018 年，福山区完成了大成棧旧址修缮工程方案的编制。2025 年，完成了屋面瓦件检修更换、墙体清理抹灰、木构件更换及油饰等工程。

2021 年，福山区完成了斗余天主教堂修缮工程设计方案

的编制。2022 年，完成了屋面瓦件及木构件检修更换、正脊岔脊恢复、墙面清理抹灰、油饰及地面恢复等系统工程。2025 年，完成了墙基及围墙除险加固工程，增设了院内排水系统。

长效保护机制的构建

经过系统修缮，三处文物建筑本体安全得到保障，历史风貌得以恢复。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文物安全，福山区注重制度建设，构建了长效保护机制。

一是完善日常管理制度体系，制定安全与执法巡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执法监督等制度，明确安全保卫、值班、消防等职责与责任体系；二是推进联合执法，福山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区城管局、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多次对保护范围内的违章建筑开展联合执法，并与公安机关建立长效联合执法机制，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三是落实协同管理，推动文物行政部门、使用单位、所在镇街三方协同管理，配备安保人员 24 小时看护，不定期开展文物安全检查，形成日常看护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管理格局。

活化利用的路径探索

在做好修缮保护与制度保障的基础上，福山区立足文物建筑资源禀赋，探索公益性文化空间建设与考古科研功能植入等活化利用路径，实现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事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建设公益性文化空间

修缮工程完成后，福山卍字会旧址被改造为公益性文化空间——福山书院城市书房。通过公开招投标，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福山分公司取得其运营权，作为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福山书院以公益性、社会性、文化性为导向，是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文化平

观察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内，两名孩子在舟山眼镜蛇和莽山原矛头蝮标本前手抓、脚踢，随行父亲非但未加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导致莽山原矛头蝮标本受损。（光明网 2026 年 8 月 30 日）

据悉，馆方正在评估展品损毁情况。其公众号发文《强烈谴责！》，称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依据民法典，该家长可能涉及法律追责。短短数日，该事件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 3500 万，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这起事件值得深思的是：博物馆场景下允许怎样的“互动”？如何防范损毁展品事件再度上演？

近年来，“让文物活起来”已成为文博行业的共识和行动。须知，只有在保护好文物、展品的基础上，博物馆才可能谈及如何“增强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

首先，博物馆不同于游乐场，互动有规则。游乐场的互动指向娱乐，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没有过多束缚；而博物馆的互动，本意是引导观察、启发思考，而非放任无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边界，把博物馆当成可以随手触摸、任意摆弄的游乐场，“互动”就会变味，演变为无所顾忌的“乱动”，文物、展品可能会遭殃，展厅秩序就会喧闹、混乱。

国际博物馆协会指出：“博物馆是充满活力的教育中心，培养好奇心、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美国纽瓦克博物馆创始馆长约翰·科顿·达纳也说：“一座优秀的博物馆吸引人、愉悦人、唤起好奇、引导质疑，从而促进学习。”参观博物馆，尤其是自然科技类博物馆，最容易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正因如此，更要强调以合规、合理的方式满足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

其次，展品保护措施到位，不能只靠观众自觉。一方面，展馆要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给文物、展品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展品旁边的提示也不能少，明确告知观众“禁止触摸”。

博物馆内允许开展互动体验的，大多是触摸屏、操作按钮、AR 设备等功能性辅助展项，如模拟生态沙盘、可点播内容的互动展板；或是专门开辟的动手体验专区，设置化石拼图、简易标本制作等项目，鼓励观众动手参与。

技术防护是基础。珍贵展品需加装玻璃罩，

博物馆内，「互动」非「乱动」

续随子

重要展品应有红外警报，展厅内要设置安全距离、地面标识、全程监控。对于动物标本这类“裸展”展品，需要在观赏效果和展品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在特定的互动区，陈列可触摸的复制品、数字互动展项，则是可行的替代方案，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照样能得到满足。

制度设计是关键。国外一些博物馆要求家长签署“文明承诺书”，明确损坏担责。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现场管理是保障。每逢暑期，自然科技类博物馆接待量接近峰值，青少年观众占比超过半数。在人流密集的区域，需要合理规划参观路线。重点展品前，避免人流长时间聚集。展厅内贴有明显图标，也会用广播提醒，但总有“小观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时工作人员的及时引导尤为必要。

上述事件之后，馆方已将受损标本封入玻璃柜。对于博物馆来说，需不断完善防护措施和管理制度，不能只靠事后补救，相关措施和手段应当前置。

再次，观展素养培育，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有专家认为我们已建成一批硬件一流的博物馆，但与之匹配的“博物馆文化”仍需要长期培育。观展素养关乎公民素质，家长应当履行监护教育职责，从小帮助孩子树立公共规则

意识，建立敬畏展品、爱护文物的观念。

这起事件中令人愤慨的是，该家长对孩子不当行为的纵容。博物馆内，每一起未成年人引发的不文明观展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位失职的家长。

自然科技类博物馆是最佳的教育场所，孩子在这里学到的不仅是“鸟兽草木之名”，还有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文化遗产的珍惜。

从更深层看，提升全社会观展素养，依旧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考题。大声喧哗、随意触摸、违规拍照等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归根结底是公共规则意识的淡薄。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是自然演化和人类文明的见证，属于全体公众。少数人的“任性”，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参观权益，甚至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展品损毁。

当孩子下意识向展品伸手的时候，家长要明确说“不”，及时制止，并给孩子讲清楚博物馆的参观准则和礼仪。

文明参观，体现在展厅里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之间。



福山卍字会旧址

台，日常开展经典诵读、国学讲座、国画体验、朗诵培训等公益文化活动，开放期间到访和借阅的群众络绎不绝，广受好评。通过功能转换，卍字会慈善助人、服务公益的文化精神得以延续，文物建筑在保留历史原貌的同时融入当代公共文化生活，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底蕴的载体。

植入考古科研功能

2022 年，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与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签署框架协议，合作共建山东省水下考古烟台工作站，站址设于大成棧旧址。作为近代海上贸易历史的实物史证，大成棧旧址为水下考古工作提供场所支撑，带动烟台及周边区域文博事业发展，服务海洋强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国家战略。

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福山区文物管理所）与烟台市考古研究院合作共建烟台市考古研究院福山考古基地，以斗余天主教堂及附属设施为基地用房。基地在提供考古勘探服务的同时，发展“考古研学”等特色文旅业

态，促进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学术研究的有机结合。

结语

烟台市福山区近现代文物建筑的修缮保护与活化利用实践表明，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修缮保护是基础，制度保障是关键，活化利用是目标。坚持保护第一，保存文物建筑的历史信息，是活化利用的前提条件。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的长效机制，是落实保护责任、守住安全底线的制度保障。立足建筑自身禀赋，探索公共文化服务、考古科研利用等多元活化路径，是实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的有效途径。福山区将在此基础上持续完善保护机制、拓展活化路径，让文化遗产在赓续传承中充分发挥时代价值，为传承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烟台市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